

(上接第5版)

何向阳:新疆对于一位作家的滋养,是让您接了地气。原来是一个青年,回来就是一个壮年了,而且您是带着整个人生的新疆的大风景回来的。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1979年到1986年,您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井喷”的状态,那时候一打开文学刊物全是王蒙的新作,而且风格各异,有现实主义的、有现代派的、有先锋的,让读者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蝴蝶》《春之声》《海梦》,新作之多,真是让评论家们追也追不上。这种创作的“井喷”状态,不是也有新疆生活对您的激发?一下子就您的这个气给提起来了。

王蒙:新疆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和我的城市生活互相参照的一个参照物。当我写到城市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脑子里浮现的仍然是新疆农民的音容笑貌,当我写到新疆的这些事情,也有城市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以他们的存在来比较,这大概可以叫作比较地理学。刚才您提到一些作品,但是还有一个作品您没有提到,它对我个人的意义非常大,就是《夜的眼》。《夜的眼》写得非常早,那是1979年10月我写出来的,11月刊登在《光明日报》,而且《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整版。《夜的眼》的读者可能没从中看到新疆,但实际上有新疆,说到原来我待的这个地方去搭便车,手里头抓着一个羊腿,这种场面是属于新疆的,可爱,可悲。后来我写了一组收到《在伊犁》里,都是跟新疆有关系的作品,甚至其中某些还带有非虚构色彩,这些作品有的翻译成了日语,有些翻译成了英语。

对生活的热爱和恋恋不舍,构成了我写作的动力。可以说,我对于生命、活着的感受就在这里。

何向阳: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王蒙和他笔下的新疆》,图文并茂,其中的文字就选自您的《在伊犁》系列小说,记得有《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好汉子依斯麻尔》《虚掩的土屋小院》《爱拉姑娘的爱情》等,的确如您所言,新疆作为您的第二故乡,“是在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快乐和安慰,在最匮乏的时候给了我以丰富和享受,在最软弱的时候给了我粗犷和坚强,在最迷茫的时候给了我以永远的乐观和力量。”有时候我想,一个地方与一个作家很多时候是一种相互找到,新疆与您就是这么一种情形。如您诗中所写——“我变了么?所有的经过/都没有经过,我还是/你的。”还是那个“戴眼镜的巴彦岱”。同时我也注意到几十年来,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作活力,无怨无悔,真的是——所有的经过/都没有经过,这种超越能力,只有天真而深透的爱才能做到。记得一次从广州开会回来,在飞机上读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您的《明年我将衰老》,竟读得哭出了声,打动我的不止语言,更是那种化解不开的深情。近年,您的《生死恋》《笑的风》出版,作为您的忠实读者,2020年10月,我还在《人民文学》上读到您的短篇小说《夏天的奇遇》,而2019年1月的《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都以您的小说打头。就在2020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50卷《王蒙文集》。记得《王蒙文集》1983年出版时是4卷,1993年是10卷,《王蒙文选》2003年出版时是23卷,《王蒙文集》2014年出版时是45卷,时隔10年,您的作品从数量上来讲几乎翻倍,而距2014年短短5年之后,新版《王蒙文集》已达50卷,2020年新发表的作品还没有收进去呢。从数量上看,呈几何级数增长,从时间上看,它还在不断“生长”和“可持续发展”着。我个人感觉您的创作在新时代又迎来了一个巅峰期,这个巅峰期,让我想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伊始,您的一系列中、短篇,如“集束手榴弹”对中国坛造成的威力。这样的文学创造力,即使对正处于盛年的很多中青年作家而言,也都难以达到,为您旺盛的创造力感到惊喜和敬佩。您的这种创作动力,似乎一直未有停顿,这些年,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您的创作又迎来了新的井喷。

王蒙:大致是1957年底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个2000字的短篇小说叫《冬雨》,这个作品后来翻译成了捷克文、斯洛伐克文和英文,在捷克出版的3种文字的文学刊物,都把它发表了。从那以后一直到1978年,我基本上都没写过什么东西。这其中有着20年的时间是沉默着,也不能说没有发表过,因为好像1962年发表过两篇,但有相当长时间基本上写作是中断的。一旦能写作,就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写,就叫厚积薄发吧,因为歇菜20年了。我对写作的最大的动力,还是对生活的热爱,这个热爱可以表现为兴趣,也可以成为热烈与坚忍的期盼。它是一种激情,你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爱恋。

何向阳:也是一种深情。相比于小说家的冷峻分析,您的作品常常透露出的是一种诗人气质。单纯、浪漫,也很独特、果断。

王蒙:一种对生活的爱恋吧。对于我来说,写小说我很少先想到故事,而是先想到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必须要写,这种感觉必须要写,某种倒置的感觉一定要写出来。而且不光是倒置,更重要的是从倒置变成好的感觉,都是从感觉出发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恋恋不舍,构成了我写作的动力。可以说,我对于生命、活着的感受就在这里。

何向阳:几年前我曾曾在绵阳一次关于您创作的全国研讨会的发言中,引用了您的一句话,讲您的作品是写给世界的“情书”,您80岁了,仍在爱着。2020年1月参加北京全国图书订货会,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您新出版50卷文集召开了首发式,当时我望着满满当当两大箱子您的50卷文集,不能不再次感叹,这得对这个世界有多爱,才能写出这么沉甸甸的足分量的“情书”呵!

王蒙:哈哈。真是这样,这里面包括对生命的珍惜。人老了,现在86岁了,您不能说“明年”

再衰老了,但是我没有疲倦感,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现在记忆力不行了,一想到写作烦得要死。我也很同情人家,我相信他说的话,而且人家也有可能烦你,你没完没了地写也有可能造成审美疲劳。但是我仍然珍惜我的生命,珍惜我的老年,起码我最近这3年写文章来词儿就特别不一样,绝对跟过去不一样。大致上,从1996年到2012年,我这十几年正经写的很少,只写了《尴尬风流》,就是那种带有自嘲性的小短篇,要把超短篇小说都加在一块,也算个长篇了。我国有一个说法叫做“青春作赋,皓首穷经”,那几年我主要在研究孔孟老庄,后来还加上荀子,一共写了大概10本书,占据了我要的时间,但每年还都会写十几二十篇的《尴尬风流》。2012年以后,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因为我生活上、情感上有更大的变化和刺激,一个是和我同甘共苦半个多世纪的爱人瑞芳去世了,后来我跟单三娅有了新的结合,我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个人和情感的变化,同社会生活剧烈迅猛的发展和结合在一起了,我又开始中短各种作品都写起来了。

何向阳:2012年,对您个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您个人生活情感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再一次结合在一起,2012年之前,您有一阶段的创作多集中于对老子、庄子的文化解读上,好像从2012年以后,您又开始大量写小说了。

王蒙:对,也可以说是一次新的井喷,其中有历史的背景,有个人生活,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所以我的创作确实又掀起了一个实际的高潮。2018年,《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都在4月刊发了我的作品,对我来说确实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甚至于我还要说这里头也有文化的变化,因为那一段我谈文化问题的人也比较多,有文学的话题,有语言的话题,我一进入那个语言圈里就欲罢不能,光这些词就把你给点燃了。我最近又开始写新的小说,当然我不能向读者保证说还能再写多少年,但是目前,说起文学创作、小说创作,我仍然在兴奋之中,不管你写多少论文,多少语子百家的研究文章,一写起小说,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我想说得瑟,后来改成抖擞,其实我心里想的也可能是哆嗦。

何向阳:这个状态太好了,就是舞蹈的状态,这种跳舞的状态,就是所有细胞都调动起来的状态,是作家写作中最活跃最投入也最忘我的一种状态。

王蒙:说得太棒了,确实是跳舞的感受,是发狂的感受,我从来没有感到写作是这样动感,是在满场飞地跳动。

何向阳:最近读您的《笑的风》,您把中篇改写成了一个长篇,里面还有一些诗歌,这些诗都是您原创的吗?您的诗集我读过。相比而言,您的小说的诗情性越来越强。我是说这太有意思了,是一种叙事和诗意相互交织的状态。

王蒙:这是我从《红楼梦》里学的。中国人对我们平常说的五言七言诗非常有兴趣,吃喝拉撒睡,会客、游戏、娱乐、喝酒都要写诗。曹雪芹不动在小说里就来一段儿。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见,小说、戏曲、还有词(实际上是唱词)都是低俗的,文章和诗才是高雅的。曹雪芹当时潦倒不堪地写小说,同时他提醒读者,他也会写很好的诗。《红楼梦》写元妃省亲的时候全是歌颂的诗,连林黛玉写的都是歌颂的,“盛世无饥馁,何用耕织忙”,但这不是林黛玉写的,而是曹雪芹写的。我的文集里,最早的作品就是10岁做的第一首古体诗《题画马》,那时候我每天都在学画马,可是我绘画没有任何才能,却写了“千里追风谁能敌,长途跋涉不觉劳,只因伯乐无从觅,化作神龙上九霄”。我当时10岁怎么就想出这种诗了,而且摆出一副怀才不遇的架势,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何向阳:您这番话让我想起,您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作家的学者化问题。我以为这也是一个对于作家的精神资源的建设问题,这一问题当时一经提出就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在作家学者化问题上,您一直是您理论的实践者,可以说在这方面您一直身体力行,您关于庄子的作品就至少写了三部,《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而且都是在一两年内完成的。还有《老子的帮助》,从“孔孟老庄”一直到李商隐的注疏,《红楼梦》的解读,今年您刚刚完成了历时4年写作的荀子的研究著作。您在大量的小说创作间歇,还兴致勃勃地写下了甚至在某一时间段就体积与容量而言都比小说创作本身大得多的文化随笔、研究著作,又出版了《王蒙讲孔孟老庄》青少年版,2020年6月还用了27天三集一共30分钟几乎是一口气录完了80集的《红楼梦》讲解视频,从中可以看出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真心热爱。您关于中华文化的写作,从先秦开始一直到唐代,又跨越到清代,好像历史上一大的文化脉络全部贯穿起来了,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这种写作您是有意识的,还是一种兴之所至?抑或在历史文化与现实创作中找到一种特有的交替互融的书写方式?看得出您对这些与古典文化有关的写作都非常快乐。

王蒙:是这样的。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第三次作代会时,我在大会发言时已经提到我们的作家需要提高文化知水平。作家不要求都是学者,因为作家和学者是两个路子,但是越来越非学者化真的是一个问题。您可以想想曹、郭、茅、巴、老、曹,他们的教育程度、学历知识程度,对外语的掌握,对他们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下过乡、扛过枪、种过地,参与过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党的生活等等。但是我觉得一个作家要面对写作,学识还是必要的。我是爱学习的一人,我就是一个学生。现在包括对外语,再难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去学,但是严格的达标并没有做到。今天的学习范围更大了,特别是对于一个作家的学习而言,不能满足于光从网上看到的信息。

何向阳:还是要读书,要阅读。对一位作家而言,学习是多向度的,也几乎是无止境的。

王蒙:现在从我们国家层面来说,党中央、政府对于学习的提倡不遗余力,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政协也在建设学习型组织群,各单位也都



特别重视学习,个人也都注意增长自己的知识,说得夸张一点,这个重视程度是空前的。对于学习而言,我个人一直有这个爱好和愿望。

何向阳:记得2000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印度,您是我们团长,在印度举办的中国电影节的开幕式上,您做了半小时的英语演讲,言及中国电影、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以及中、印文化间的学习与交流。语言表达在您来讲,很多时候都可以信手拈来。好像在语言方面,您有着过人的天赋。听说您47岁开始学习英语,每天要记忆的词汇量都是一定的。

王蒙:其实我英语语言的能力还远远不过关。那次有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中央电视台九频道当时找我做一个英语的关于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对谈,后来我就被迫恶补,那会儿十几天天天在写中文的稿子,请中国翻译协会的领导黄友义先生帮我翻译成英文,我连那个重音都注上,一边查着字典,一边每天从早念到晚念了十几天,后来谈得还挺好。这也是我的一个乐趣,当然有显摆的成分。记得有一次,日中友好协会欢迎我带的一个代表团,我在欢迎活动上用日语致辞。在伊朗的一个对外文化活动中,我用波斯语讲了15分钟。后来2010年在哈佛大学举行中美作家主旨演讲,我是用英语讲的。2020年底,在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行的艾克拜尔·米吉提翻译的《阿拜》首发式,我是用哈萨克语讲话的。在土耳其的安卡拉,我当时还当着文化部部长,在参加一个官方欢迎会时用土耳其语发言。我还访问过阿拉木图,在活动中讲哈萨克语。我可不是说这些都懂,好些都不懂,但是我把拼音写上,我说的那些语言都和我学习维吾尔语有关系,波斯语、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在莫斯科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也用俄语致过答词。我也算是有志于促进各民族与中外的文学语言相互亲近和理解。对不起,这有点中国式的说法,叫做“老要猖狂”了。

何向阳:语言的习得其实也是一位作家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尊重。语言最基础,也最根本,是文化的最小细胞。这方面的融汇贯通会带来不一样的视野。当然每一代作家都有他那一代的文化使命,对您作品的阅读中一直获得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您的叙述中有一种坚不可摧又游刃有余的文化自信,坚定与幽默共在的这种表达方式,令人阅读时能获得一种智慧享受。

王蒙: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这么一个思路:期待圣贤。圣人是什么意思呢?首推孔子,他能够给人民教化,叫做“天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让人家知道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这样才能安居乐业。孔子是最重视文化的,重视文学艺术,尤其是重视诗。他是《诗经》的责任编辑,而且他认为要从《诗经》看出世道人心,要培养人的精神上的格局。加上《孟子》,总体来说就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或者是“思无邪”。诗的作用一个是“不读诗,无以言”,另一种是要通过读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们把文学的责任讲得很清楚。历史文学也是他编辑,包括孔子删定编辑《春秋》,其实那个时候文学和历史是不分的。您看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算历史记忆,但非文学,很多篇章都充满小说性。《鸿门宴》《霸王别姬》是写得很好的小说。而且这种文化追求、文学追求,正是权力的依据,我们所称颂的是“内圣外王”,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他是一个圣人,“外王”就是他对社会所做的事情,取得了很大的带动、影响、发展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喜欢讲人格,“格”和“境界”,不管是诗词也好,文章也好,戏曲也好。中国还有一个说法,叫“不关风化物,纵好也枉然”,风化也是对人的作用,就是有利于树立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树立或者推动人民的教化。老百姓的教化,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经济、生态方方面面的文明。

文学的责任是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是对历史的责任,是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我们的文学完全应该有更好的经典,更辉煌的经典,更对得起未来的经典作品。

何向阳:中国一直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一代代的文学书写也多得得益于这一传统。

王蒙:对,文以载道,当然,我认为文学家、写作者,有些个人的一己的考虑,这也不足为奇。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看到富尔曼诺夫写《夏伯阳》的故事,他以日记的形式,说“成名的思想已经让我昏了头了,我现在激动得感到写出来以后非成名不可,我简直受不了了”,这样的个性化的想法也无可厚非,你有成名的思想,这也不算什么,但这跟作品对社会的作用、对道德的启示、对风化的启示,与作家真正的内心世界,是没办法比的,这是一种作家人格,所谓责任心,是对中国文化的责任,对有利于社会、有利于风化、有利于发展的责任。

何向阳:十分辩证。您刚才提到“人格”一词,

我非常感兴趣。这也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必然会遭遇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可惜的是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理论界的更多关注。我2011年出版的《人格论》里曾试图谈论这个问题。人格,当然从学术上讲是一个“拿来”的概念,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虽然没有提出“人格”这个明确的概念,但以一贯之的文化对于人的内在修为一直是有其要求和指向的。以中国倾向于形象描述而不擅长定义的习惯,明代思想家胡敬斋在其文集曾有这样对“圣人”境界的比喻,“屹乎若太山之高,浩乎若沧溟之深,纬乎若日星之炳”,相对于“万世之师”的圣人,“君子”由其现实性所获得的群体性几千年来超越了单一的历史或单独的学派,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典范,推动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它树立了一种做人的标准,同时也是我们在经验世界的重要参照,它的几乎无所不在显示了在中国文化的强大,我们的人格存在,是对于这一文化事实的提取和发展,所以人格于我们而言是“活”的,它是敞开的,带有强烈的实践性,人是“人格”的一个“半成品”,而“成人”,则显示了人格的不断调适而臻于完善的过程。这样看,文化传统、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经历铸就作家人格,而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文学形象及人格精神,经过作家铸造的文化人格又进一步影响和铸造着成千上万一代代读者的社会人格。所以人格无小事,作家的“立言”,从大的方面来讲也是“立人”。作家人格——作为“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对于社会心理、文化演进负有责任,它直接参与了人类精神的创造和提升。在您的作品中,我刚才讲到了趋光性,还有就是向善性,您的小说的人物身上——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劳动者,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都有一种将事情向好处想的乐观和豁达;也可以说是不屈服于命运的自信,在任何命运给出的戏本中,他们都能以最真实的面目、最善良的本质对待生活。这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君子人格”。文学的书写其实是把自己的心交给读者,交给社会、交给文化漫长的历程,所以作为主体的人的“心”特别重要。这里当然也有一个表达的问题。在表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个艺术表达的尺度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蒙:古今中外再言说是说起哪个著名的人的作品,您脑子里都会出现作者的形象,他对人民有着深切的爱恋。比如说李白,你能想象他大概是什么样,但是又没法很具体,杜甫跟李白就不一样,曹雪芹跟李白、杜甫也不一样,另外李白又跟曹雪芹、李白、杜甫、屈原不同,屈原有另外一股劲,屈原的责任感太强了,因为他是三闾大夫,不是一般人,他对楚国的责任始终在那里,所以在这方面他会有所选择,但更重要的还是对生活的深刻的理解,对老百姓,对人民的这种深切的爱。

我最近在看电视剧《装台》,这个电视剧由陈彦的小说改编,这部作品还被评价为当年的中国好书。陈彦写了很多生活中的老百姓、小人物,有好人,也有无知的,不讲理的,坑害老百姓的人,像铁主任就专门坑害装台的工人,装台的工人很可怜,要编制没编制,要合同也没有合同,家庭教育也有很多问题。一些人的婚恋也有遗憾,都离真正的爱情和互助有很大差距,甚至都不完全符合《婚姻法》,这其中刁顺子的闺女也是很让人受不了。另外,它恰恰写出了在中国社会物质和精神水准相对低一点的群体中,甚至在半文盲、文盲式的人物里面,仍然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些美好品质在起作用。比如责任、敬业、团结、互助、与人为善,这个作品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收视率非常高,就是因为其中可以看见老百姓的生活,作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电视剧之所以取得成功,我觉得关键就是它跟那种概念化的戏剧不一样,它让你感觉到非常强的生活质感,内容驳杂,杂而不乱,方言、饮食、戏剧、生活琐屑,一应俱全。里面的爱情不是知识分子的爱情,不是干部的爱情,也不完全是过去那种老农民的爱情,也不能说是商业性的爱情,你看刁菊花那个人,脾气再坏但有自己的尊严和骨气——你越有钱我越给你拿糖,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你对生活有着真情实感有深切体验,你对人民有大爱,写起来就得心应手,既不发生怎样的问题也不会发生文思枯竭的问题,怎么写都对。你要有生活,有爱心,有充足的经验,才能不显出捉襟见肘。我觉得,咱们都应该琢磨琢磨《装台》,这对于咱们树立写作的信心、文学的信心、语言的信心有益。电视剧再调整改编,毕竟也是跟文学有关系的,所以文学仍然是基础,是艺术的母本。比如您要听一个音乐,听一部交响乐,怕大家听不懂,先每人发一册说明书,那等于用文学来解释,所以从事文学的人是有重要的责任的,在自身之外还要给整个文艺创作提供各种各样的脚本和参考。

何向阳:的确如此。作家不但要有代际传承的文化责任,也同时要有对于同时代其他艺术门类创作思想引领的一份文化责任。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时代中,对于作家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说到代际方面的文化责任,这也是一种作家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一部作品的诞生有时也不只是作家单独一个人的事,尤其在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期。您在多个场合讲到过一些老作家对您创作最初的帮助,比如您提到过1955年,在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会的董毅同志,给您开介绍信,

为您提供了一半的创作假。中国作协2020年年初又重新恢复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创作研究部,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任务很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围绕作协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协调、组织作协各业务部门和社会力量开展面向青年作家和读者的文学活动,先后在广西、西藏召开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团结、凝聚青年作家包括新文学群体的力量,发挥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巨大潜力。推动更新一代人的创作,也是已经取得成就的每一位作家的责任。作为“人民艺术家”,您于2020年捐赠款项,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了王蒙青年文学专项基金,用于奖励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创作,做出这样的决定和举措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蒙:因为我必须面对现实,我已经86岁零3个月了,和《青春万岁》那本书里不同,我已经耄耋之年而且走向黄昏之年了,而文学的希望、文化的希望在青年身上。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我仍想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是比你们和我们更年轻的一代。

我从来不轻视网络文学作品,我有时候看网上的一些小说,一类是小资类型的,还可以;一类是知识型的也挺好,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还是一位高级领导介绍给我的,把书寄给我了。另外我也看到了网上有一些相当穷极无聊的、低俗的作品,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一些文学青年的创作偏弱,青年作者、青年作家、青年诗人、青年演员、青年编辑的队伍还可以增强,我希望在我日渐老去的日子同时也能够表示出自己的一份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国家有更多的文学业绩更多的文学瑰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70多年了,我们可以想一想,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中间经历了30年,这30年间有鲁、郭、茅、巴、老、曹,有胡适、徐志摩、张爱玲,当然还有丁玲、艾青、赵树理、欧阳山等革命的文学家。那我们呢?我们的队伍阳子后代,给历史留下文学经典和文学的业绩。英国人有个说法很惊人,“英国可以没有英伦三岛,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实际上英伦三岛不能没有啊,要是这没有了他们就没了国土了,这个说得比较夸张,但是说出狠劲儿来了。文学的责任是“狠”的责任,是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是对历史的责任,是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我们的文学完全应该有更好的经典,更辉煌的经典,更对得起未来的经典作品。

何向阳:记得2017年8月15日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一文中,讲到一次在开封清明上河园听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为歌词的合唱,“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您说您感动得热泪盈眶,并在文中称,“哪怕仅仅为了欣赏辛弃疾的诗词,下一辈子,下下辈子,仍然要做中国人。”足见您对中华文化的深爱。前不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强调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文化建设的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您认为文学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方面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您对2035年有什么愿景和期待?

王蒙: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人民日报》还约我写了一篇短文,150字对新的征程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一些想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马上迎来建党100周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包括个人的精神生活、私人生活、家庭生活轨迹,其中有很多故事很多事情还远远没有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当我们概括一个时期或者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的时候,我们抓的往往是“纲领”犖犖大端,但是文学恰恰是以小见大,在表现春天的时候还要把枝枝叶叶、点点滴滴、花蕊花瓣蚊虫都表现出来,而这个生活之丰富是历史上非常少见的,有获得就有失落,很简单。我从1991年开始就用电脑了,最早是从“286”开始,可是回过头再想起用蘸水钢笔写作的年代,也很有意思,我开始写《青春万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非得用蘸水钢笔写,用英雄牌的时候用水笔都写不出来,更早些时候鲁迅是用毛笔写的,矛盾是用毛笔写,管桦是用毛笔写的,起码人家都留下了很多的手稿,现在都没手稿了,所以我觉得各种事情应该有历史感。手机给咱们提供的便捷、快乐真是不可想象,现在我们都是“无一日不可无手机”甚至“每小时不可无手机”,进一个饭馆,先想知道的不是菜谱,而是WiFi密码。可是反过来讲,现在有多少人沉浸在手机、沉浸在浏览里,而深度的阅读反倒不如过去了。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现在全世界的统计中国人的阅读量不在前列,没有以色列、韩国、意大利、法国人阅读量多,这也是个大问题。

我们对文化的期待、对文学的期待,彻底落得实惠物下来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艰苦奋斗,还得苦干,我们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对生活的理解、表现和把握,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这里面的学问还大着呢,活儿还重得多,其间既有迅速的发展,又有对古老传统的继承。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装台》,其中既有中国文化的老老实实在分、耐性、忍辱负重,也有不断追求新的标准、新的方式、对艺术的把握,就连刁顺子时间长了也有点艺术细胞了。人的快乐、困惑、收获、失落、艰难、喜悦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对这些的感悟,对于建设文化强国的理解还需要深化、研究和部署,这确实是一个大学问,而且也是一个责任如山的任务。

何向阳:感谢您王蒙老师,祝您新年快乐!期望新的一年读到您更新更多的作品,也期望您健康长寿幸福。等到2035年,您101岁时,希望我们还在一起畅谈文学、畅谈未来。

王蒙:谢谢。悄悄告诉您一句,有位老朋友前些日子来看我,对我的要求是,一定要活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我还差远呢。谢谢朋友们的祝愿。新年好!谢谢!